

中国近十年职业技术教师教育发展的 政策理路与演进逻辑

王海莹 丁力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将职业教育发展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我国职业技术教育教师发展更是波澜壮阔。经过近十年的探索,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政策框架下,职教师资队伍建设形成了更加完善的政策体系:政策理念凸显“三性融合”和“理实一体”,政策举措注重“多主体协同”。政策演进逻辑呈现以下特点:教师培养从注重“规模”到“规模与质量”并举,任职资格从参照普通教育模式到更加鲜明的类型教育,评价考核从“单一主体”完善为“多元参与”,教师权利从注重“社会价值”走向“社会价值”与“个人权益”并重,执行主体从“自上而下”单一化到“上下结合”多主体协同。

【关键词】职业技术教师教育 政策理路 演进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将职业教育发展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职业教育日益在服务现代经济社会、改善民生及促进就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缘于此,我国职业技术教育教师进入高质量发展轨道,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职业技术教育教师发展道路。回顾近十年来职业技术教育教师发展政策的理路与演进逻辑,对于深入认识中国需要发展一个什么样的职教师资队伍、中国应该怎样发展职业技术教师教育有着重要意义。

本研究聚焦与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教师发展高度相关的政策和文件,时间跨度为 2012-2022 的 10 年,通过构建政策分析框架研究这期间党和政府颁布的相关职业技术教育教师的政策文本,试图通过分析以呈现政策理路与演进逻辑。

一、研究设计

(一) 数据与方法

按照“政策检索—政策筛选—政策分析”的基本步骤对政策文本进行研究。首先,选择国务院网站、教育部网站等平台进行检索,以“教师”“职业教育”作为检索的关键词,采集自 2012 年以来所有中央、部委颁布的法规和公开文件,经仔细阅读、谨慎对比和筛选,排除不相关的会议通知等文件,下载 66 份作为最初分析样本;其次,我们以“双师型教师”“职教师资”“职业学校教师”“职业技术教师教育”为表征的关键词进行手动检索,并

经过核验,确定 48 份政策文件形成研究的最终样本(如表 1 所示);最后,运用词频分析等文本分析方法,对这 48 份政策文件政策目标、政策举措等内容进行了关联分析,为系统梳理职业技术教育的政策理路和变迁逻辑提供思路。

表 1 2012-2022 年国家层面职业技术
教育教师政策一览表

序号	发文时间	发文主体	政策名称	文号
1	2012.8.6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教师工作司 2012 年工作要点》	教师司〔2012〕54 号
2	2012.8.20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国发〔2012〕41 号
3	2012.9.14	教育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 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等文件	高教〔2012〕9 号
.....				
48	2022.5.17	教育部	《关于开展职业教育教师队伍能力提升行动的通知》	教师厅函〔2022〕8 号

(二) 分析框架

政策分析通常有三种分析模式:麦考尔—韦伯分析模式、沃尔夫的分析模式及邓恩的分析模式,其中邓恩的政策分析模式涵盖面更为广泛,涉及问题的构建、政策的描述、实施效果的回溯、政策价值的评价等,其中问题的构建处于核心地位,政策分析不仅要注重以事实为根本,而且还要以价值为基础。^[1]

合理的分析框架是政策分析的基础,虽然邓

收稿日期:2023-04-28

基金项目:2024 年度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哲社一般项目“基于管理自由度的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团队研究”(A2024001)

作者简介:王海莹,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职业技术教师教育学院研究员,教育学博士;丁力,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副校长、研究员,上海职业技术教师教育学院智库首席专家,管理学博士。

恩模式的分析框架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但是职业教育发展体系不同于普通教育体系,其根植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T·W·舒尔茨曾经指出,传统经济理论中资本的概念仅包含生产资料和货币,而忽视了重要的生产要素——人的能力,难以对经济增长做出合理的解释,人力资本投资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关联,然而,两者之间的制度内涵却远未明确。^[2]参考邓恩的政策分析模式和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构建由政策理念与路径(X轴)、政策演进逻辑(Y轴)和政策动因(Z轴)构成的职业技术教育教师政策分析框架(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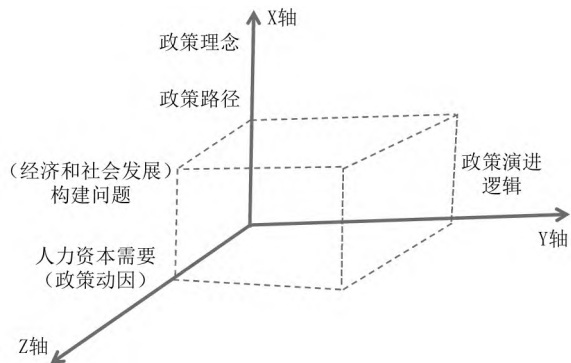


图1 职业技术教师教育政策分析框架

图1展示了职业技术教师教育政策理念、路径、演进逻辑与经济社会发展、人力资本需要之间的逻辑关系,其中构建政策问题始终是政策的缘起。经济社会学理论和政策分析学科实际上是对政府的选择行为进行系统探索。^[3]因此,本研究对职业技术教师教育政策的分析试图回答下述问题:职业技术教师教育问题如何进入政策议题成为政策问题?职业技术教师教育政策问题的基本内容是什么?政策遵循是按照什么理念设计的?在政策实施中采取了哪些具体行动措施?这些具体行动措施按照什么逻辑进行演进?

二、职业技术教师教育政策的发展理念与路径

职业教育发展质量取决于师资配置、硬件设施、保障措施及政策主体间协同机制设计。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崛起和职业教育规模扩张,职业教育的硬件设计、保障措施及政策主体间协同机制设计越来越完善。三者对职业教育的促进效用较之以前有所降低,而职业教育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职教师资的关键因素越来越凸显。经过十年探索,在职业教育政策的整体框架下,职业技术教师教育发展的政策理念、政策路径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逐步形成更加完

善的职业技术教师教育发展的政策体系。

(一) 政策理念凸显“三性融合”和“理实一体”

长期以来,无论家长、学生,还是社会大众,都很难跳出职业教育被视为“断头教育”“吸引力欠缺”的“低层次教育”的固化歧视和重重链锁,以至于社会陷入“考试—升学—文凭—找工作难”框架下的内卷窠臼,然而,现代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所需的人力资本的各项技能是公共政策的核心要素,职业教育是人力资本技能提升的必要支撑,是共同富裕的动力引擎。这就意味着,在回答“如何建设职业技术教师队伍”时必然涉及教师培养的人力资本的各项技能。伴随职业院校的迅速发展,大量从普通学校转岗的文化理论知识基础较为扎实而专业实践技能和动手能力薄弱的师资队伍成为制约职业院校发展的突出障碍。^[4]教育教学能力、专业实践能力、职业能力决定着教师素质的高低,我国职业技术教师队伍建设政策坚持教育性、职业性、专业性的“三性融合”和“理实一体”理念,其实现方式通常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1. 建设“校企实践平台”锤炼“专业实践性”。职业技术教师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技能人才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这就决定了职业技术教师教育只有通过产教融合培养,才能为区域产业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撑。^[5]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文,决定加强产教融合师资队伍建设,推动职业学校、应用型本科高校与大中型企业合作建设“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6]政策实施至今,国家已遴选了101家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基地,主要承担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师国家级培训任务,接纳教师定期到企业进行工程技术实践、专业技能实训,与合作院校互派人员交流兼职、开展产教研合作等。^[7]虽然随着“双师型”教师学校与企业培训基地实践平台的打造,产业的专业壁垒有所突破,但是由于新冠疫情与企业参与培训的政策激励有限,职教师资的“专业实践性”并未得到明显改善。正如穆勒(Armin Müller)在评价中央政策的实际影响力时所言:“一般来说,政策的影响力相当薄弱。”^[8]

2. 完善职业技术教师标准体系,凸显“教育性、专业性、职业性”。教师素养提升的相关改革也应以体系建设为主。^[9]专业性、科学性的职业技术教师标准体系是职业院校师资队伍质量建设的关键。以往职业学院对师资的专业招聘要求可能会停留在专业理论水平的学历层面,对师资的专业实践能力重视不够。随着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要求的推进,在构建有中国特色职教教

师培养培训体系过程中,清晰而明确的“双师型”教师标准必不可少^[10],为此,自2019年起,国家推进以“双素质”为导向的新教师准入制度改革,完善职业教育教师资格考试制度,在国家教师资格考试中,强化专业教学和实践要求,按照专业大类(类)制定考试大纲、建设试题库、开展笔试和结构化面试。^[11]同时,2021年教育部、财政部在《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2021—2025)的通知》中明确要求把职业标准、专业教学标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行业企业先进技术等纳入教师培训必修模块。在新教师准入方面,目前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院校都严格按照“职教师资21条”的要求“不再从未具备3年以上行业企业工作经历的应届毕业生中招聘”。政策从源头上提出职业学校教师所必须具备的“职业标准”“专业教学标准”“职业技能”等要求,有效引领了其专业发展,规范了其教学行为。

3. 实施教师教育专业认证提高职业技术教师教育水平。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综合性大学、高水平工业大学等高校举办的职业技术师范教育是职业院校教师供给的源头,专业质量直接决定着职教师资队伍质量。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方案》)中明确指出:“加强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建设,优化结构布局,引导一批高水平工科大学举办职业技术师范教育”。^[12]依照政府统筹规划方案,优化职业技术师范教育的结构布局,一方面,要构建以职业技术师范院校为主体的培养培训体系,提升职业技术师范教育质量;另一方面,要适应现代社会转型和技术变革的需要,支持高水平工科大学举办职业技术师范教育,构建院校企融合的职业技术师范教育多元培训格局,办好高质量的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和高质量的职业技术师范教育专业,探索与专业学院、职业学院、企业协同培养教育硕士、教育博士等“双师型”教师的新模式。建设高质量的职教师资队伍要从职业技术师范教育专业的认证入手。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印发的《职业技术师范教育专业认证标准》(教师司函〔2019〕50号)对职业技术教师教育专业进行认证,其主要目的是提高职业技术教师教育专业准入门槛,规范学校或学院的办学行为。三级认证制度的实施,进一步检测了院校的办学行为,打造了合格专业、树立了专业质量标杆,强调职业技术教师教育类毕业生应具备的专业知识、专业实践能力、教学能力及沟通合作能力,最终希望达成学生会教学、学会育人、学会发展,推动了职业技术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二) 政策路径注重系统的“多主体协同”

“通过何种政策路径实现政策理念”是政策体系框架建设的落脚点,十八大后,按照“加快构建高质量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政策思维及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教育部门联合其他相关主体出台了诸多职业技术教师教育相关政策。例如,2019年相关部门按照多主体协同的系统性政策思维逻辑颁布了《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印发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等政策文件。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要求职教师资培养组织必须树立开放式的“系统性”逻辑。^[13]系统的“多主体协同”的政策举措能够有效帮助“双师型”教师培养机构、企业、职业学院、专业学院建立与“双师型”教师培养目标链接的系统,为多种政策主体协同推进职教师资队伍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例如,为了确保职教师资跨界协同培养的效果,相关政策明确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工作联动机制,解决职教师资建设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为了确保职教师资队伍企业实践质量,相关政策要求政府加强统筹作用,依托高校、职业学院、专业学院、企业建立院校企多向交流合作共同体,鼓励院校企在“双师型”教师培训、实践课程开发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为了增强职业技术教师职业吸引力,教育部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主体联合发布政策文件,将职教师资队伍建设和职业技术教师教育类专业作为财政支持的重点投入项目,鼓励各个区域依据自身经济发展实际情况,适时提高职业技术师范专业生均拨款标准。尽管历来中国职业技术教师教育政策的修辞让多数观察家相信,中国已经建立起系统的“多主体协同”路径,但是,政策举措变成现实依然需要深入探索。

三、职业技术教师教育政策的演进逻辑

根据世界银行的界定,教师政策包括教师培养补充政策、任职资格政策、教师聘任政策、岗位管理政策、专业发展政策、待遇保障政策、退休政策、教师评价政策、教师权利政策等。^[14]参照此界定,发现近十年中国职业技术教师教育政策形成以下演进逻辑。

(一) 培养培训:从注重“规模”到“规模与质量”并举

相对于高等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体系于21世纪才初步形成,“十四五”时期,国家将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作为战略目标,职业教育是短板,职业技术教师教育质量更是关键。跨入新世纪,教育部分别在“十一五”“十二五”期间连续印发《加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主要解决生师

比过高、“双师型”教师和兼职教师比例偏低、教师实践教学能力不足等问题。^[15]2016年,中等职业教育生师比基本达到设置标准20:1,教师数量不足问题明显好转。^[16]但是职教师资专业知识和教学实践能力难以与新时代发展相适应。由规模向规模和质量并重转变是职业技术教师教育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的“完善教育教学相关标准”“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均指向“质量”诉求,追求“规模与质量”并重将是我国职教师资队伍建设未来发展的趋势。

1. “双师型”教师培养:从教师个体“双师素质”向结构化“创新团队”转变

虽然我国提出“双师型”教师概念已有30余年,但是政策和理论对“双师型”的表述大都建立在个体教师“双重能力”培养上,一定程度上固化和限制了职业学校办学范畴。2019年,《方案》提出分专业建设一批国家级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传递出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从教师个体“双师素质”向结构化“双师型”教师团队转变的强烈信号。此后,“双师教学创新团队”“双师结构化教学团队”成为政策高频词。为了高质量建设职业院校师资队伍从而服务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印发《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方案》(教师函〔2019〕4号),面向职业院校,聚焦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人民需求的民生领域,分批次在3年左右培育360个结构化的国家级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团队,职业院校教师与企业导师分工协作,进行模块化教学,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辐射带动“双师型”师资队伍整体质量提升。此外,教育部还落实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团队走出去战略,开展团队境外进修等形式,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职业院校教学创新团队。

2. 培养形态:从“师范教育”到“教师教育”

“教师教育”是我国在借鉴国际教师培养培训所经历师范学校、教师学院、教师教育大学化三个阶段基础上形成的舶来词汇。^[17]在“十一五”期间教育改革与发展相关文件中将“教师教育”界定为“在终身教育思想指导下,按照教师专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教师的职前培养、入职教育和在职培训的统称”。^[18]自此,无论是在理论话语体系、实践话语体系,还是政策话语体系中,“师范教育”逐步从教师培养的教育形态逐步演化为教师职前教育。^[19]在“师范教育”向“教师教育”过渡中,逐步形成以教师专业发展为核心的理念^[20],提高职业技术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是“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根本路径,不仅注重建立提升教师的个人成长通道,还要结合教师教学创新

团队建设。针对职教师资队伍依然存在着企业实践经历和教师教育不足的实际情况,《方案》指出探索建立教育见习制度和企业实践制度,提升职教师资的专业素养。

(二) 任职资格:从参照普通教育模式到更加鲜明的类型教育

自1995年12月教师资格证制度开始实行以来,教师资格证成为教师入职的必要条件。但是,由于职业技术教育与职业学院长期存在着供应与需求的不匹配,大部分职业院校在招聘教师时往往只对学历提出要求,对专业方面较少予以契合学校学科发展的限制性规定。相对于普通中小学体量而言,虽然中等职业学校体量小,但专业繁杂,在2023年5月更新的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中,中等职业教育专业共有农林牧渔等大类专业18个,361个目录专业^①,远比普通中学语、数、外等13个学科繁多。由于专业繁多和个别学科招收教师较少等原因,一直难以形成国家职业教育教师考试标准,部分职业学校教师资格考试形式和内容参照或采用普通中学的模式。但是,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不同于从事普通教育的教师,其不仅要具备从事普通教育的理论素质,而且还要具备实践教学能力,担负着为技能型社会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双师型”教师。因此,国家开始探索注重企业实践经历和专业技术技能的职业技术教师标准体系,教育部对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出要求,并进一步对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培训、准入、培养、考核等进行规范,先后颁布《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教师〔2013〕12号)、《中等职业学校校长专业标准》(教师〔2015〕2号),规范教师 and 校长的专业发展、教学行为及治理能力。

(三) 评价考核:从“单一主体”完善为“多元参与”

2012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深化教师教育改革的意见》指出,开展师范类专业认证及评估工作,建立高校教师教育自我评估制度。此后,在各类职业技术教师教育政策文件中,体现自我评估制度的单独评审和分类评价被强调。2015年,教育部编制了《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对职称评聘和工作绩效单独评审,并推动教师分类管理、分类评价的人事管理制度改革。该政策随后在各地展开,取得较为良好的效果,但是为了客观、公平,开始强调评价考核向过程性评价、社会评价以及多元评价转变。2019年,《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印发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

型”教师队伍建设的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教师〔2019〕6号)提出深化突出“双师型”导向的教师评价改革,改革的着力点在于建立多元参与的教师考核评价体系,参与考核的主体既有职业院校,又有行业企业和培训评价组织。2021年8月,教育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2021—2025年)的通知》(教师函〔2021〕6号)指出健全考核评价机制,此文件与《教师〔2019〕6号》文件相比,更强调共同参与评价,并将政府纳入评价主体,进一步明确支持第三方机构开展评估,具体列出评估的方式:专家实地调研、学员匿名评估等方式,多主体共同参与和引入第三方的评估考核更为公平化和科学化。同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进一步指出,针对“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改革情况,重点引入企业行业参与评价,探索与职业教育发展相适应的教师评价机制。可见,不管是评价考核主体,还是具体的评价考核方式,正逐步走向“多元共同参与”,评价考核更注重过程性评价,职业技术教师队伍的评价考核呈现出多元化、过程化、细化、量化及科学化的演进逻辑。

(四)教师权利:从注重“社会价值”走向“社会价值”与“个人权益”并重

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在《关于教科文组织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TVET)战略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在目前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下,对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投资未尝不是一个加速经济复苏和使之得以持续的措施”。^[21]同样,我国也不例外,党和政府充分认识到世界正处于大变革调整之中,这个时期我国人民对公平美好教育迫切向往,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将全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到政治任务 and 民生工程的高度,明确指出:兴国必先强师。2019年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改革实施方案》(教师〔2019〕6号),开篇就明确指出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对于现代职业教育改革的意义,即建设高素质“双师型”队伍是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近两年,政策在满足兴国需要的同时兼顾教师群体和教师个体的需要,体现了“社会价值”和“个人权益”并重,“以人为本”正在成为职业技术教师教育政策的价值引导,它要求教师培训的目标、内容以及培训形式等都要考虑到参培教师的切身需要。^[22]例如,在《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政策文件的政策话语体系更多地出现“落实权益保障”等“以人为本”价值导向的表述。

(五)执行主体:从“自上而下”单一化到“上下结合”多主体协同

梳理中国职业技术教师教育政策文件发现,随着职业教育治理模式从“政府——学校”二元格局向“政府——学校——市场”多元格局转变^[23],建立张弛有度的管理模式,为创意产生创造空间条件。^[24]职业技术教师教育政策逐步由“自上而下”的“政府—学校”执行路径演进为“上下结合”的跨领域、跨机构、多层次、多主体协同执行的综合性政策议题,具有显著的“系统多元”“跨界协同”属性。职业技术教师教育政策执行主体也不再只是由教育部开展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的单一化模式,而是由教育部牵头,其他政府机构协助支持,发展为多机构联动协同,特别是2020年颁发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由教育部等九个国家部门围绕着“职业教育如何提质培优”联合发布政策行动路径破解职业教育痛点问题,其中位于核心层的政策执行主体是以中央政府和教育部、财政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相关职能机构为主导;次要核心层的政策执行主体是以工业与信息化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务院扶贫办、农业部为中心的国家职能部门;外层政策执行主体是自2020年由政府机构向外延伸至省人民政府层面。职业技术教师教育政策需要政府、社会、产业、企业联动方能达成“双师型”教师培养目标,因此,负责不同行政职责的政策执行主体之间只有相互配合,共同融合成一个浑然天成的政策执行系统,才能对政策的执行成效和目标达成产生积极影响。

完善的职业技术教师教育政策永远在路上,只有政策设计、制定、实施的起点,没有终点;职业技术教师的质量提升只有相对高度,没有绝对高度。党的十九大之后,在职业技术教师教育政策的引导下,高质量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以较高水平支撑着职业技术教师教育的发展,展现了中国政策智慧政策方案。

注 释

①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http://www.moe.gov.cn/s78/A07/zcs_ztzt/2017_zt06/17zt06_bznr/zhijiao/。

参 考 文 献

- [1] 威廉·N·邓恩. 公共政策分析导论(第2版)[M]. 谢明,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 [2] 西奥多·舒尔茨.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论文集[C].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1.
- [3]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经济学(第4版)[M]. 北京:中国

- 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 [4] 郭静.“双师型”教师政策分析:文本、执行与展望[J].职教论坛,2018(2):64-69.
- [5] 余东升,朱俊.产教融合:职教本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J].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2):8-11.
- [6]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号)[EB/OL].[2023-05-19].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12/19/content_5248564.htm.
- [7] 教育部等四部门.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教师〔2019〕6号)[EB/OL].[2023-05-19].http://www.moe.gov.cn/srcsite/A10/s7034/201910/t20191016_403867.html.
- [8] MUELLER A. Cooperation of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enterprise in China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skill formation in nursing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preliminary findings[J]. Working paper on east studies, 2017(1):1-34.
- [9] 石伟平,林玥茹.新技术时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变革[J].中国电化教育,2021(1):34-40.
- [10] 张洪华.中国职教师资培养的探索与创新(1978—2018年)[J].职业技术教育,2018(28):42-47.
- [11][12]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9〕4号)[EB/OL].[2023-05-19].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2/13/content_5365341.htm.
- [13] 王海莹,丁力,常小勇,等.自组织视角下“系统”的职教师资培养逻辑[J].江苏高教,2022(7):119-124.
- [14] 李廷洲,吴晶,王秋华.改革开放40年我国教师政策的变迁历程、主要特征与发展前瞻[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9(1):103-110.
- [15] 教育部.关于“十二五”期间加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EB/OL].[2023-05-19].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moe_950/201112/t20111224_129045.html.
- [16] 李新发.中等职业教育教师培养调查分析与建议[J].职教论坛,2018(4):79-87.
- [17] 郭志明.学术课程与专业课程的较量与融合[J].教师教育研究,2019(4):111-115.
- [18] 教育部.关于“十五”期间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EB/OL].[2023-05-19].<http://www.xaipe.edu.cn/rsc/info/1017/1294.htm>.
- [19] 陆道坤.再论“师范教育”与“教师教育”[J].教师教育研究,2019(6):86-91.
- [20] 钟秉林.大学的走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311.
- [2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关于教科文组织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TVET)战略草案的报告[R].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
- [22] 翁伟斌.教师培训走向何方[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73-82.
- [23] 郝永贞.“双师型”教师政策执行困境与突破[J].职教论坛,2022(2):83-89.
- [24] 王海莹,丁力,杨旭辉.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的管理自由度:何以与何为[J].教育发展研究,2022(22):77-84.

The Policy Logic and Evolution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Teacher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Past Ten Years

Wang Haiying, Ding Li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have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the level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China has been even more magnificent. After nearly ten years of explor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polic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vocational teachers has formed a more perfect policy system; the policy concept highlights the “integration of specialization, professionalism and edu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ories and practice”, and the policy measures pay attention to “multi-subject coordination”. The logic of policy evolution present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teacher training from focusing on “scale” to “scale and quality”, job qualifications from referring to the general education model to more distinct type education, evaluation and assessment from “single subject” to “multiple participation”. Teachers’ rights go from “social value” to “social value” and “Individual rights and Individual interests”, and the executive subject is from “top-down” singularity to “up-down combination”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on.

Key words: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teacher education; the policy logic; evolution logic

(责任编辑 任令涛)